

在南非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在由男性控制的议会里,她形单影只,却从不低头,为争取黑人的自由权利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顽强斗争。她就是

海伦·苏斯曼,一位——

为正义而战的勇敢女性

李 锋

2009年的第一天,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活动家海伦·苏斯曼与世长辞。1月4日,南非举国为她降半旗致哀。南非总统莫特兰蒂和前总统姆贝基出席了葬礼,她生前的好友、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也派了至亲作为自己的代表来到葬礼现场。

在南非现代历史上,海伦·苏斯曼有着特殊的位置。当顽固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国民党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海伦成为南非议会里绝无仅有的公开谴责当局倒行逆施的议员。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是一位白人女性。

1917年11月7日,海伦·苏斯曼出生于南非豪登省,来自一个东欧犹太裔移民的家庭。她在南非金山大学毕业后便成为该校的讲师。1937年,她嫁给了苏斯曼医生,两人育有两个女儿。海伦对政治感兴趣始于上世纪40年代,一方面与她大学时的经济学专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她积极参与南非种族关系协会(研究种族问题的自由派组织)的活动不无关联。1953年,她跻身政界,被选举为团结党的国会议员,在此后的36年时间里,海伦为争取南非黑人的自由权利进行了令人敬佩的斗争。

在1961年到1974年的13年里,海伦是南非178名国会议员中唯一敢于公开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她的战场是种族主义者的议会,这里是战斗的最前线,无异于与虎谋皮。她利用国会议员的有利身份走进南非的监狱和黑人城镇等被白人政权规划的隔离区,她倾听黑人的声音,同情黑人的遭遇。她抗议当权者对政治犯的野蛮虐待,她对道德的坚守和对争取人权的不懈战斗给了南非国内政治犯和国外流亡者以巨大的勇气。她不止一次踏上罗本岛,那时候被判终身监禁的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领袖正在岛上服刑。在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一书中,曼德拉用形象的语言记录了他在罗本岛见到海伦时的情景:“看到这

位勇敢的女性在门外注视我们的牢房并在院子里徘徊,那真是一幅让人奇怪而又美好的画面。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给我们的牢狱生活带来一丝色彩的女性。”海伦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在议会发表,因为议员的言论可以不通过审查就能见诸媒体,海伦正义的声音得以传遍南非。南非前国防部长莱科塔说,正是海伦一次次的呼吁和斗争,才使得岛上政治犯原本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

在海伦数十年的议员生涯中,她被誉为“对种族隔离政策最有效的议员批评家和插入政府肌体中的一根刺”。在一个由白人男性控制的议会里,这位犹太裔女性显得形单影只。但是她直言不讳,从没有放弃有一天南非将成为自由国家的希望。海伦在议会以善于揭露问题而闻名,她的政治立场和雄辩口才更是让对手既痛恨又敬畏。曾经有理屈词穷的议员高声质问海伦,称她提出来的问题使南非难堪,海伦冷静地回答道:“使南非难堪的不是我的问题,而恰恰是你的回答。”

海伦的正义声音在议会里回荡,响亮而清晰。但是这个为正义呼喊的声音却遭到其他177名议员的攻击和诽谤,因为她坚称所有的南非人都有权投票,法治应当获胜、人权应该普及,这在当权的种族主义者听来是痛苦的。她经常被警察骚扰,电话时常被窃听。对付窃听海伦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拿起电话对着听筒吹口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非,海伦的言论经常被主流媒体批判,他们称她为“自由主义者”,而这一称谓在那个年代就是“爱国”和“国家敌人”的同义词。但今天,已经没人怀疑海伦要比那些高坐在议会大厦里专注于维护种族理念和狭隘利益的议员们更热爱南非。

坚定的信念支撑海伦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而历史也见证了海伦对正义的坚守。1990



1990年,退休后的海伦·苏斯曼与老朋友曼德拉在她家中国子里合影。

年,曼德拉获得了自由,前南非政府开始了与非国大的谈判,1994年,南非举行了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曼德拉当选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至此,海伦的正义梦想变为现实。退休后的海伦依然执著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她热情赞扬南非新政府在推行民主、改善民生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严厉批评新政府在某些领域的政策失误。有人说,是海伦开启了南非政坛的反政府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海伦·苏斯曼的影响力逐渐超越南非国界,她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世界各地的多所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名校。

如今,这位战士走了。南非人在网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海伦,我们向你致敬!在那个艰难的时期你是政府里唯一的反对派;虽然你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你是成千上万人的喉舌;你从未动摇,永远与真理、正义和正直同在。对于各种肤色的南非人而言,你就像是一座光明的灯塔。你是上帝赐给南非的礼物,我们哀悼你的离去,感谢你将生命与我们分享。”

“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冲沙。”这是老祖宗们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国家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量入为出,节约资源。因为一个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且有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这里天蓝草绿,空气清新,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在澳大利亚随处可见大片的绿地、公园和步行道,它们之所以能够保持着原始的形态,而没有修成大规模的商业区、住宅楼或者停车场,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明白,只有节约资源,善待脚下的这片土地,才会造福于子孙后代。

因工作的原因,我在澳大利亚待过一年,深深地体会到,澳大利亚人对于资源的节约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有一天,我和朋友在悉尼逛街,商场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收费也便宜,3小时1澳元。商场很大,逛着逛着就忘记了时间。当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東西回到停车场,将车开出去的时候,却被告知,要付7.7澳元。我们满打满算也就是停了4个多小时,最多收2澳元罢了,怎么要这么多?收费的管理员指了指门口的收费牌,上面清楚地写着:3小时以下,1澳元;3—4小时,2.5澳元;4—5小时,7.7澳元;5—6小时,18.70澳元;再往上,每多停一小时多收11澳元!我很不理解,可是朋友解释说,这样收费就是为了防止车主停车没有时间观念。因为这是公共停车场,我们停的时间长了,别人就没法停,这叫公共资源。多占用公共资源的人就得付出代价!

无独有偶。一天我和朋友外出旅游,办旅馆住宿时,老板对我们说,住一晚,一个房间90澳元,住两晚,160澳元。我们问,那住三晚呢?老板说,对不起,我这儿只能住两晚,住三晚,你换地方。我们十分惊奇,有这样做生意的吗?他们简直就是拒顾客于千里之外,在国内住店,你住一年都可以,只要你腰包里有钱。可是在澳大利亚,居然会有这样的经营方式,这不明摆着跟钱过不去吗?老板见我们满脸疑惑,就唠唠叨叨地解释说,我们这里玩两天足够了,玩3天就是多余。政府和当地人都认为,游客太多,对这里的环境是一种摧残。旅馆也一样。风景啊,环境啊,旅馆啊,都是公共资源,只能提供给需要的人。

原来,在澳大利亚人看来,资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仅仅是水、电、气那么简单。在这个地球上,每一样东西都是有限的,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不能随便去浪费。

回国以后,我常把自己的这段经历不厌其烦地讲给朋友们听。希望大家明白,同澳大利亚人相比,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的资源更少,而节约资源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自觉行为。只有这样,将来我们的子孙才会不至于置身于一个资源枯竭的国度,我们才不会背上浪费的骂名。

资源有限 节约无边

邓 勤

旅人心语



漫步海枣城

张金江

来到西班牙小城埃尔切,海枣树的身影无处不在,小城内外有大片的海枣林,据说有20万到30万株,除在街道两旁、街心花园、私人庭院里种植外,大部分集中成片,形成海枣园。漫步埃尔切,有时甚至分不清是身在林中还是身在城中,城市与海枣交相掩映(见题图,张金江摄)。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里的海枣园列入“世界人类遗产名录”。

海枣树干笔直,高大挺拔,树上挂满了果实。果实一簇簇地挂在叶子之间,沉甸甸地向下垂着。因成熟度不同,果实有的金黄,像金桔,有的深紫,像葡萄,但果形是圆筒的。当地人称,海枣树雌雄异株,雌树结果,雄树无果。每年10、11月是海枣的收获季节。海枣树的果实叫海枣,或椰枣。记得小的时候,人们都叫它“伊拉克蜜枣”。据说当时北京商店里卖的海枣都是从伊拉克进口的。伊拉克所在的西亚以及北非地区是海枣的故乡。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原无海枣,埃尔切又怎么有这么大片的海枣林呢?

在埃尔切的海枣博物馆我找到了答案。专家说,海枣树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在2000至3000年前从西亚和北非带来的。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来到伊比利亚半岛。在出土的罗马人烧制的陶器上,就有海枣树的图案。但把海枣培育成林,把一片干旱的不毛之地变成富饶绿洲的,则是8世纪初来到西班牙的阿拉伯人。

这些阿拉伯人来自干旱的北非。他们擅长用水,堪称变荒漠为绿洲的专家。他们将建设绿洲的技术运用于埃尔切,开发了大片海枣园。经过一代代的精心呵护,埃尔切的海枣园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欧洲最大的海枣林。

埃尔切的海枣园都是开放的,人们可以在林中散步、游览。圣普拉西多海枣园仍保持几百年前阿拉伯人时代的样子。园子里都修成长方形的畦田,畦田种着海枣树,水渠把一块块畦田连起来,用从远处引来的水灌溉。畦田里,海枣树之间都有较大距离,中间的空地种些低矮的果树、蔬菜或粮食作物。这样多层次的种植方法可有效利用土地和水,高大的海枣树可为低矮的作物遮挡强烈阳光的照射,抵挡强风的侵袭。

“神甫”园是埃尔切最有名的海枣园。园子的名字源自100多年前在这里当神甫的主人。“神甫”园占地1.3万平方米,有1000余株海枣树。它出名皆因园中一株叫“帝王”的海枣树。海枣树可以活200年,这株“帝王”海枣树大约170岁了。海枣树多为独干,也有长到10多岁时从根部生出分枝的。让人称奇的是,这株“帝王”海枣30岁时一下长出7个分枝,且一反从根部生出的常态,7个分枝都从主干距地面高2米的地方长出来。“帝王”海枣的名字跟西西公主有些关系。据说1894年西西公主光临“神甫”园,看到那有7个分枝又异常茂盛的海枣树,甚为惊叹地说,这株海枣有帝王风范呀。之后,园主人卡斯塔尼奥神甫就将它命名为“帝王”了。经受了170年风雨,“帝王”海枣仍枝繁叶茂,高达20米,重量超过8000公斤。为帮助它支撑过重的躯干,园主人给它装上了结实的金属支架。

株株海枣树婀娜多姿,让城市变得妩媚动人。海风习习,海枣叶发出窸窣窣窣的声响。在这林中城或是城中林中漫步,到小店选购些褐色的油光闪亮的海枣,边走边品,边聆听海枣树的低语,赏心悦目,十分惬意。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现在是否要加上“人人要当护树使者”几个字?

埃及人 一月过圣诞

黄培昭

在一般人眼中,圣诞节是西方基督教徒的节日,与伊斯兰国家埃及无关。其实,埃及在公元6世纪被伊斯兰化之前,基督教便盛行起来。如今,基督教徒占埃及总人口的1/10,他们不仅重视圣诞节,而且还将它打造成了地地道道的“埃及版”节日。

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相比,埃及圣诞节的最大特色就是时间不同,不是12月25日,而是1月7日。众所周知,圣诞节是基督教的最大节日。所谓“圣诞节”,是人们庆祝耶稣诞生而进行的盛大庆典活动。由于《圣经》上没有记载耶稣到底生于哪一天,所以信徒们产生了分歧。大多数人认为是12月25日,少数人则坚信为1月7日,埃及的基督徒就是这少数派观点的拥戴者,所以他们将圣诞节定在了1月7日这一天。5年前,埃及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将1月7日定为埃及的圣诞节。从2008年圣诞节起,全国的基督教徒开

始享受带薪休假。

埃及圣诞节的另一特色是圣诞老人的名字“本土化”。西方国家称圣诞老人为“Santa Claus”,埃及人则称圣诞老人为“努威尔爸爸”,圣诞期间,埃及的“努威尔爸爸”无处不在。饭店里,在装饰辉煌的圣诞树和青翠的盆栽侧柏旁边,自然少不了圣诞老人的身影,有雕塑,也有穿着圣诞老人服饰的扮演者。在商店门前和穿梭往来的车流空当,也

总能看见“圣诞老人”或向人们微笑、招手,或手举各种圣诞礼物和纪念品进行兜售。

红、绿和白,是埃及人公认的圣诞颜色,圣诞节期间,他们用这3种颜色装饰房屋。讲究一些的人家,屋子里除了圣诞树或象征生命长久的塔形常青藤外,还常摆着圣诞花和圣诞蜡烛,堂屋的高处则悬挂着色彩斑斓的彩灯、礼物和纸花等,把节日的气氛渲染得浓郁

从裁缝之子 到戏剧大师

周晓茅

2008年圣诞节这一天,占据英国各大报刊乃至重要英文媒体头条的不是圣诞老人,而是英国剧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因为就在平安夜悠扬的钟声中,他子然而去……

2008年12月26日,伦敦西区,沉默的观众。品特的经典戏剧《无人地带》在这里上演……英国人以这样的方式,向自己的戏剧大师致敬。

与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品特也是犹太后裔。他于1930年出生,儿时在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聚居区里度过,周围充满了肥皂厂散发出的难闻气味。幼时的经历、排犹思潮以及二战,让他对危机四伏环境下的人际关系有着独特的体验。

品特12岁在伦敦上小学时,就开始接触戏剧表演,从此立志从事戏剧业。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劳动者,却非常理解和支持他。品特回忆道:“那年我14岁,一天夜里,我在厨房里写诗,当时我正和一个女孩处在热恋之中——我这个人相当早熟。长夜难眠,我含泪写着伤感的诗篇。早晨6时左右,我爸爸进来了,他正准备去上班,他是一名裁缝,总是在早晨6点半离家,下午6时30分才回来。我爸爸这时问:‘你为什么睡不着?’我伤感地抬起头说:‘我在写东西。’他说:‘让我看看。’他拿过去看了看说:‘很好,继续写。’”或许正是这样的鼓励,给了小小少年自信和勇气,最终攀上了文学创作的高峰。

青少年时期的品特颇具叛逆、反抗的个性。18岁时,他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因为戏剧见解和学院中师生不同,于是假装神经崩溃而退学。

1957年,品特写了第一个剧本《房间》,之后进入创作的活跃期,接连写出《生日晚会》、《看管人》、《归乡》等几部代表作,成为继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有人把他划归于贝克特那样的“荒诞派”,而他却自称是“威胁喜剧”,因为其作品强调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威胁”,这种威胁既来自外部,也来自自身。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说品特“揭示了日常闲聊中隐藏的惊人危险,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封闭的空间”;《纽约时报》圣诞节当天的纪念文章则说他“擅长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不祥之兆和平静中的噪声,这种天才使得他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并且被其同代人所模仿”。

品特的作品被视为战后英国最激进的前沿戏剧,尽管如此,却并非曲高和寡。英国是莎士比亚的故乡,一般民众都把看戏视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光是伦敦就有近百家剧院。品特的戏有时不为伦敦西区的主流戏剧标准所接受,观众却愿意掏钱买票看,加上他懂得利用广播电视的渠道广开门路,因此他在商业上也大获成功。

中国观众对品特并不陌生,其作品《情

品特的代表剧作《生日晚会》剧照。



品特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天,手持拐杖接受记者采访。此前他曾不慎摔倒,头部受伤。

人》和《背叛》被反复搬上国内舞台,尤以1992年赵屹鸥导演的上海青艺版《情人》最为火爆:上海演了45场,国内巡演300多场。当时正值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上演该剧几乎被境外媒体看成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

2001年末,品特被诊断患了食道癌,一向坚强的他也感到十分无助。妻子和丈夫都鼓励他与病魔搏斗。有一次做化疗时,一位护士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些癌细胞,它们怎么忘记了死?”品特为这种表述深深打动,于是便写了一首诗,题为《癌细胞》,发表在2002年3月的《卫报》上。诗中写道:“我希望看到我的肿瘤死去/一个忘记去死的肿瘤/可它正打算谋杀我……”——尽管他最终没能杀死癌细胞。

除了戏剧,品特对政治的热衷也是众所周知的。2002年10月和2003年1月,他两次在英国国会发表反战演讲。2003年,他出版诗歌选集《战争》,抗议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因此获得了下年度的威尔弗雷德·欧文奖。2005年3月,他宣布终止戏剧创作生涯,集中精力从事政治活动。由于身体欠佳,品特没有去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只是通过录像发表获奖感言。他强调,“入侵伊拉克是强盗行径”,“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应送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受审”。结果,他这个缺席者反倒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人。媒体对他演讲的报道,大大超过了对颁奖典礼本身的报道。人们说,这样的缺席实际比出席更有力量。